

媒体负面报道、诉讼风险与 审计费用^{*}

刘启亮 李 蕙 赵 超 廖义刚 陈汉文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430072 江西财经大学会计学院 330000 厦门大学管理学院 361000)

【摘要】本文研究媒体负面报道对审计收费的影响,并进一步探讨这种影响的实现路径。利用2001-2009年我国A股主板上市公司的数据研究发现,公司面临的媒体负面报道越多,审计收费越高。进一步分析发现,会计方面的媒体负面报道和首次媒体负面报道会引起审计师提高审计收费,然而这些影响均只存在于高诉讼风险的环境下。此外,本文还发现,无论是高风险阶段还是低风险阶段,媒体负面报道都会使公司容易受到监管部门的行政处罚。本文可能表明,在转型经济中,媒体对审计行为的治理作用可能需通过法律环境的改善来实现。

【关键词】媒体负面报道 诉讼风险 审计费用 行政处罚

一、引言

作为信息媒介(Fang and Peress, 2009)的媒体负面报道具有信息传递功能,可能会揭示客户存在的潜在问题和风险。根据Simunic(1980)的发现,对于风险较高的客户,审计师会通过提高审计收费来控制诉讼风险,弥补预期的损失。如杨德明和刘敏(2013)初步发现审计师会对具有媒体负面报道的客户提高审计收费。与此相关的重要问题是,尚不清楚审计师是迫于声誉压力还是诉讼风险预期提高了审计收费。尽管自2002年1月15日之后,对于公司的虚假陈述,投资者可以起诉公司和审计师寻求赔偿,但是直到2006年1月1日新证券法和公司法的实施以及法律执行力度的加强——2006年7月31日法院判决华伦会计师事务所因蓝田股份事件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成为我国的第一起审计师民事赔偿案,审计师才开始面临实际意义上的民事赔偿风险(刘启亮等,2013)。这就为我们检验到底是因诉讼风险还是声誉压力迫使审计师提高审计收费提供了一个有利的制度背景。为此,我们用中国证券市场2001-2009年A股主板上市公司(不含创业板上市公司)的数据来研究媒体负面报道是否是通过诉讼风险来促使事务所提高了审计收费。

进一步,到目前为止,在我国证券市场审计师承担民事赔偿责任主要是在虚假陈述方面,同时,我国的审计市场竞争也非常激烈(刘启亮等,2013)。关于公司的媒体负面报道既包括会计方面的报道也包括非会计方面的报道。那么,为了留住客户,审计师是否只对会计方面的媒体负面报道才提高审计收费呢?此外,媒体负面报道既包括首次

报道也包括重复报道,作为专业人士,媒体重复报道对审计师而言没有增量信息,那么,审计师是否只对首次媒体负面报道才提高审计收费呢?这是本文将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本文研究媒体负面报道对审计收费的影响,并进一步探讨这种影响的实现路径,主要贡献在于以下两点:第一、本文首次研究发现媒体负面报道是通过司法环境的改善来对审计师的收费行为产生影响,进一步深化了现有关于媒体负面报道与审计收费问题(杨德明和赵璨,2012)的研究。第二、本文进一步细化了媒体负面报道的分类,发现会计方面的媒体负面报道和首次媒体负面报道会对审计收费产生影响,可能表明审计师因自身承担民事责任的范围和媒体报道本身的信息含量而对媒体报道进行了区别性对待,拓宽了媒体负面报道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学术增量贡献。

本文余下部分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为文献综述、制度背景与研究假设,第三部分为研究设计,第四部分是实证结果与进一步分析,第五部分是额外分析与稳健性检验,最后是结论与总结。

二、文献综述、制度背景与研究假设

自Simunic(1980)开创性地研究审计收费的决定因素以来,国外大量的文献从各个方面探讨了审计费用的影响因素,如客户规模、资产结构、业务复杂性、审计对象本身的风险系数(如库存和应收账款是高风险审计项目)、及审计意见等(Francis, 1984; Firth, 1985; Newton and Ashton, 1989; Strue, 1991; DeFond et al., 2000)。此外,一些文献从审计委员会特征(Abbott et al., 2003)、内部控制(Krishnan et al., 2008; Raghunandan and Rama,

^{*} 本文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海外及港澳学者合作研究基金项目(71328201)和面上项目(71172206)的中期成果之一。本文通讯作者是陈汉文。

2006; Hogan and Wilkins, 2008)、事务所合并 (Iyer and Iyer, 1996; Firth and Lau, 2004; Pong and Burnett, 2006) 等角度进行了进一步拓展研究。

国内基本上沿用了 Simunic (1980) 的模型, 从客户和事务所两个层面进行了研究。首先, 基于客户层面的研究几乎都发现被审计单位的资产规模和子公司个数是影响审计收费的两大主要因素 (如: 张宜霞, 2011; 宋衍蘅, 2011; 邢立全和陈汉文, 2013)。此外, 一些文献则基于财务报告内容 (刘斌等, 2003)、公司治理结构和所有权性质 (蔡吉甫, 2007)、内部控制的复杂性 (张宜霞, 2011)、公司披露被处罚信息 (宋衍蘅, 2011)、集团统一审计 (伍利娜等, 2012)、媒体关注 (吕敏康和冉明东, 2012)、产品市场竞争强度及竞争地位 (邢立全和陈汉文, 2013) 等方面进行了研究。其次, 基于事务所层面则从审计意见的类型 (韩厚军和周生春, 2003)、事务所区域因素 (刘斌等, 2003)、事务所的声誉 (张宜霞, 2011)、事务所合并 (李明辉等, 2012)、事务所被处罚 (刘笑霞, 2013)、金融危机环境下是否由“四大”审计 (张天舒和黄俊, 2013) 等方面展开了研究。

当市场上信息不确定性程度较高时, 媒体报道传递信息的功能将越发凸显 (孔东民等, 2013)。刘启亮等 (2013) 则发现媒体传递公司风险信息的途径是: 先由媒体揭露公司存在的财务问题等, 然后由监管部门介入调查, 接着投资者根据监管部门的处罚结果进行起诉。这样, 作为信息媒介的媒体负面报道就成了揭示公司潜在问题和风险的信号。扮演外部治理机制角色 (Fan and Wong, 2005) 的审计师会根据这个信号来判断公司潜在诉讼风险的大小, 一方面, 他们在进行审计时会更加谨慎以降低审计失败发生的可能性, 这需要执行更严苛的审计程序和增加审计投入, 审计成本将由此增加。如朱春艳和伍利娜 (2009) 发现上市公司被处罚当年, 审计师的反应程度最强烈, 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概率最高, 要求的审计费用也最高。另一方面, 为了弥补未来期间可能承担的诉讼损失, 最大限度地规避风险, 审计师也会提高审计收费。如杨德明和赵璨 (2012) 发现, 媒体负面报道越多, 公司下一年的审计收费会越高。因此, 我们提出如下假设:

H1: 公司面临的媒体负面报道越多, 审计收费越高。

投资者等起诉审计师是否成功的关键在于法院是否能有效地执行相关法律规定。尽管最高人民法院于 2002 年 1 月 15 日颁布了“关于受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侵权纠纷案件有关问题的通知”, 并于 2003 年 1 月 9 日颁布了“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 进一步细化了审计师因虚假陈述导致的民事赔偿诉讼。但是在 2005 年以前, 相关规定一直没有得到较好地执行。我们通过百度等手工统计了法院受理的涉及事务所的民事赔偿案件 (见表 1), 发现从 2001 年到 2004 年, 事务所卷入的上市公司民事赔偿案件共 25 件, 仅涉及 1 家事务所, 判决结果是该事务所无需承担赔偿责任。因此, 尽管媒体负面报道揭示了客户的风险, 但由于相关法律法规的执行较差, 在这个阶段审计师面临的实际诉讼风险较低。同时, 中国审计市场的竞争一直很激烈 (刘启亮等, 2013), 因此, 在这个阶段, 审计师为了留住客户, 对具有媒体负面报道的客户可能不会提高审计收费。

2006 年 1 月 1 日新公司法和新证券法 (以下简称“两法”) 同时生效实施。接着, 2007 年 6 月 11 日最高人民法院颁布了新的司法解释, 明确规定了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不实报告并遭受损失为由提起民事侵权赔偿诉讼的, 人民法院应该受理。这可能表明, 中国的法律环境发生了明显实质性的变化。统计发现, 从 2006 年到 2009 年 (见表 1), 审计事务所卷入的上市公司民事赔偿案件共 3852 件, 涉及到 16 家事务所, 其中 7 家事务所做出了赔偿, 5 家未赔偿, 3 家尚未判决, 1 家暂无法确定。无论是从起诉案件的数量还是涉案事务所的家数以及实际结案情况来看, 均表明审计师面临的诉讼风险已经明显增加。审计师原来面临的潜在诉讼风险成了现实的可预期风险。这样, 当公司诉讼风险增大, 会计师事务所会扩大审计程序和范围, 并且更加关注事后诉讼风险, 由此会提高其审计收费 (冯延超和梁莱歆, 2010; 张天舒和黄俊, 2013)。因此, 我们提出如下假设:

H2a: 在诉讼风险较低的情况下, 媒体负面报道不会影响审计师的审计收费。

H2b: 在诉讼风险较高的情况下, 媒体负面报道会使审计师提高审计收费。

表 1 审计上市公司的事务所涉及的民事赔偿案件统计

年度	起诉案件		被起诉事务所 (家/次数)		赔偿事务所 (家/次数)						
	案件数	涉案公司家数	Big4	Other	Big4			Other			
					赔偿	未赔	尚未判决	赔偿	未赔	尚未判决	无法确定
2001 - 2004	25	1	0	1	0	0	0	0	1	0	0
2006 - 2009	3852	16	5	11	2	2	1	5	3	2	1

注: (1) 本表的统计范围是: 凡是诉讼案件涉案年度在 2009 年年报及之前的, 均予以了统计。统计时, 凡是已经结案的, 按结案年度来确定案件的统计归属年份; 凡是 2009 年之后结案的, 或者尚未结案的, 均归属于 2006 - 2009 年度期间。(2) 在 2006 - 2009 年时间段, 有 1 家上市公司 (code: 600355) 的虚假陈述案已经结案, 然而无法查到相关资料来确定涉案事务所最终是否赔偿, 列入了“无法确定”类别。

三、研究设计

(一) 样本期间与样本选择

由于我国证券民事侵权纠纷案件的诉讼时效是2年,同时,刘启亮等(2013)发现公司被媒体负面报道之后容易在下一年受到中国证监会等相关部门的处罚,这样,如果公司在1999年被媒体负面报道就可能在2000年会受到监管部门的处罚,并在2001年底可能遭到投资者起诉。因此,我们选择的样本期间是2001-2009年。同时,由于2006年实施的新法律在2005年就公开征求意见了,可能会在2005年产生一个过渡性影响,因此,本文排除了2005年。如假设部分和表1所述,我们将2001-2004年视为低诉讼风险阶段,将2006-2009年视为高诉讼风险阶段。

由于通过对比分析有媒体负面报道公司在被媒体负面报道前后审计收费的变化,更容易看出媒体负面报道对审计收费的影响并较容易控制其它因素的影响,因此,如表2所示,本文使用有媒体负面报道公司的自比样本(观察值为3600个)来分析,同时,为了增加结论的稳健性,本文也使用横比样本(观察值为4186个)和全部样本观察值(观察值为6691个)来做稳健性测试。

表2 选择过程

2001-2009年主板市场A股上市公司的观察值	12,601
剔除:2005年的观察值	1,352
金融行业公司观察值	178
当年IPO公司	626
控制变量缺失的观察值 ^①	3,754
全部样本观察值((1)+(2)+(3))	6,691
其中:(1)有负面报道的公司年度观察值	1,095
(2)有负面报道公司在样本期间无负面报道的年度观察值	2,505
(3)在样本期间完全无负面报道公司的年度观察值	3,091
自比样本((1)+(2))	3,600
其中:2001-2004年	1,714
2006-2009年	1,886
横比样本((1)+(3))	4,186
其中:2001-2004年	1,469
2006-2009年	2,717

我们从《高校财经数据》中的《中国经济新闻数据库》下载了2001-2009年关于上市公司的所有纸质版新闻数据进行了整理,根据报道内容仅保留了关于A股上市公司的负面报道。

(二) 回归模型与变量定义

主要借鉴Dao et al. (2012)、Wang et al. (2008)的模型,我们使用如下模型来做多元回归检验。

$$\begin{aligned}
 \text{AuditFee} = & c_0 + c_1 \text{NegPRS} + c_2 \text{Current} + c_3 \text{ARINV} \\
 & + c_4 \text{LEV} + c_5 \text{ROA} + c_6 \text{Loss} + c_7 \text{Sale} \\
 & + c_8 \text{RET} + c_9 \text{STDRET} + c_{10} \text{Export} + c_{11} \text{Big4} \\
 & + c_{12} \text{SqrtSegment} + c_{13} \text{Initial} \\
 & + \text{Year dummies} + \text{Industry dummies} + \varepsilon
 \end{aligned}$$

变量及其含义如表3所示。

表3 变量及其含义

变量	定义
<i>Auditfee</i>	公司当年的审计费用总额取自然对数
<i>NegPRS</i>	虚拟变量,如果公司上年审计报告日之后至本年审计报告日之前被纸质媒体进行了负面报道,该变量取值为1,否则为0
<i>NegPRS_Acct</i>	虚拟变量,如果公司上年审计报告日之后至本年审计报告日之前被纸质媒体进行了会计方面的负面报道,该变量取值为1,否则为0
<i>NegPRS_Oth</i>	虚拟变量,如果公司上年审计报告日之后至本年审计报告日之前被纸质媒体进行了管理和其他方面的负面报道,该变量取值为1,否则为0
<i>NegPRS_First</i>	虚拟变量,如果公司上年审计报告日之后至本年审计报告日之前被纸质媒体首次进行了负面报道,该变量取值为1,否则为0
<i>NegPRS_Repeat</i>	虚拟变量,如果公司上年审计报告日之后至本年审计报告日之前被纸质媒体重复进行了负面报道,该变量取值为1,否则为0
<i>Current</i>	流动比率,以流动资产除以流动负债
<i>ARINV</i>	应收账款与存货之和除以年末总资产
<i>LEV</i>	资产负债比率
<i>ROA</i>	总资产报酬比率
<i>Loss</i>	虚拟变量,如果该公司当年亏损取值为1,否则为0
<i>Sale</i>	公司销售收入总额取自然对数
<i>RET</i>	股票的年回报率
<i>STDRET</i>	根据市场模型计算的日回报残差的标准差
<i>Export</i>	哑变量,如果公司有出口销售(包括出口到港、澳、台地区),取值为1,否则为0
<i>Big4</i>	哑变量,如果公司由国际四大审计,取值为1,否则为0
<i>SqrtSegment</i>	公司业务分部的个数取平方根
<i>Initial</i>	哑变量,如果公司由一家事务所进行前1或2年的审计,取值为1,否则为0
<i>Year dummies</i>	年度效果哑变量
<i>Industry dummies</i>	行业效果哑变量

① 由于公司业务分布的数据缺失较多,在这里损失了较多的观察值。

(三) 描述性统计

表4是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其中 *Auditfee* 的均值为13.049,中位数为13.017,媒体负面报道 (*NegPRS*) 的均值和中位数分别为0.302和0,会计方面的媒体负面报道 (*NegPRS_Acct*) 的均值和中位数分别为0.229和0,其他方面的媒体负面报道 (*NegPRS_Oth*) 的均值和中位数分别为0.117和0,首次媒体负面报道 (*NegPRS_First*) 的均值和中位数分别为0.298和0,媒体重复负面报道 (*NegPRS_Repeat*) 的均值和中位数分别是0.117和0。其余控制变量与刘启亮等(2013)的数据基本一致。

表4 描述性统计

变量	均值	中位数	标准差	p25	p75
<i>Auditfee</i>	13.049	13.017	0.518	12.751	13.305
<i>NegPRS</i>	0.302	0	0.459	0	1
<i>NegPRS_Acct</i>	0.229	0	0.420	0	0
<i>NegPRS_Oth</i>	0.117	0	0.321	0	0
<i>NegPRS_First</i>	0.298	0	0.457	0	1
<i>NegPRS_Repeat</i>	0.117	0	0.321	0	0
<i>Current</i>	1.426	1.175	1.071	0.816	1.654
<i>ARINV</i>	0.276	0.252	0.172	0.145	0.376
<i>LEV</i>	0.549	0.524	0.335	0.382	0.646

续表

变量	均值	中位数	标准差	p25	p75
<i>ROA</i>	0.013	0.025	0.096	0.007	0.049
<i>Loss</i>	0.157	0.	0.364	0	0
<i>Sale</i>	20.564	20.580	1.404	19.779	21.418
<i>RET</i>	0.415	-0.064	1.062	-0.301	1.025
<i>STDRET</i>	0.023	0.023	0.009	0.016	0.029
<i>Export</i>	0.262	0	0.440	0	1
<i>Big4</i>	0.035	0.	0.183	0	0
<i>SqrtSegment</i>	1.635	1.732	0.483	1.414	2.000
<i>Initial</i>	0.220	0	0.415	0	0

表5中,我们分析了媒体负面报道对审计收费的影响,以此来初步判断审计师是否会通过增加审计收费来控制潜在的诉讼风险。从表5中我们可以看出,在低诉讼风险阶段,媒体负面报道 (*NegPRS* = 1) 并未对审计收费产生明显影响(均值和中位数的差异均不显著)。在高诉讼风险阶段,有媒体负面报道的公司 (*NegPRS* = 1) 其审计收费显著高于没有媒体负面报道 (*NegPRS* = 0) 的公司(均值和中位数差异均显著)。此外,有媒体负面报道的公司 (*NegPRS* = 1),在高诉讼风险阶段与低诉讼风险阶段审计收费的差异(均值差异0.248,中位数差异0.223)均高于没有媒体负面报道公司 (*NegPRS* = 0) 的审计收费差异(均值差异0.165,中位数差异0.140)。这些结果初步支持了我们的研究假设。

表5 媒体负面报道与审计收费差异检验

	2001 - 2004 (低诉讼风险阶段)		2006 - 2009 (高诉讼风险阶段)		差异检验	
	均值	中位数	均值	中位数	均值	中位数
<i>NegPRS</i> = 0	12.942	12.899	13.107	13.039	-0.165 ***	-0.140 ***
<i>NegPRS</i> = 1	12.957	12.899	13.205	13.122	-0.248 ***	-0.223 ***
均值或中位数差异检验	-0.014	0.000	-0.098 ***	-0.083 ***		

注:(1) ***表示在1%的水平下显著,**表示在5%的水平下显著,*表示在10%的水平下显著(双尾)。

四、实证结果与进一步分析

(一) 媒体负面报道、诉讼风险与审计收费

如表6所示,在全样本的情况下,*NegPRS* 的系数为0.027,P值为0.098,媒体负面报道与审计收费显著正相关。这表明对有媒体负面报道的公司,审计师会通过增加

审计收费来控制潜在的诉讼风险。这个结果与杨德明和赵璨(2012)的初步发现较为一致。

在2001 - 2004年和2006 - 2009年两个阶段中,媒体负面报道均未对审计费用产生影响^②。在2001 - 2004年即低诉讼风险阶段,*NegPRS* 的系数并不显著,这表明虽然有

② 在表6的结果中,如果我们去掉年度控制变量,发现在全样本和2006 - 2009年高诉讼风险阶段,*NegPRS* 的系数均显著为正,在2001 - 2004年的低诉讼风险阶段,*NegPRS* 的系数为正不显著。同时,使用表2中的横比样本,我们发现在全样本和2006 - 2009年高诉讼风险阶段,*NegPRS* 的系数均显著为正,在2001 - 2004年的低诉讼风险阶段,*NegPRS* 的系数为正不显著。这些结果支持文中的假设2,这也表明这里的结果稳定性较差。

媒体负面报道的存在,但是由于在此阶段审计师面临的实际诉讼风险较低,审计师对媒体负面报道带来的潜在诉讼风险并不关注,因此,对审计费用并没有产生影响。在2006-2009年的高诉讼风险阶段,虽然 *NegPRS* 的系数为正,但 *P* 值为 0.209,仍然不显著,这与我们的预期不一致。结合后面表 7 和表 8 的结果来看,这可能是因为虽然此阶段诉讼风险较高,但是由于媒体报道会涉及到公司的各个方面,有一些方面的负面报道可能是审计师无法控制的,或者是与审计师审计工作内容无关的。如相关条款明确规定审计师因虚假陈述承担民事赔偿责任,那么与此无关的媒体负面报道对审计师而言就没有诉讼风险含义。因此,这部分与审计师审计无关的媒体负面报道可能干扰了结果,从而导致结果不显著。同时,我们使用横比样本则发现在 2006-2009 年阶段, *NegPRS* 的系数显著为正。这表明这个结果不太稳定。

在控制变量上,三个回归结果大致保持一致,财务杠杆 (*LEV*)、销售收入 (*Sale*)、是否四大审计 (*Big4*)、公司经营复杂度 (*SqrtSegment*) 系数均显著为正,这说明对于高负债、高收入、由四大审计以及公司经营复杂度高的公司,审计师会收取更多的审计费用。这些结果与其他学者的发现一致。此外,全样本和高诉讼风险阶段样本中, *RET* 系数显著为正。*STDRET* 在高诉讼风险阶段的系数显著为正。

表 6 媒体负面报道、诉讼风险与审计收费

	全样本	2001-2004 年 (低诉讼风险阶段)	2006-2009 年 (高诉讼风险阶段)
<i>NegPRS</i>	0.027 [*] (0.098)	0.025 (0.331)	0.027 (0.209)
<i>Current</i>	-0.004 (0.737)	-0.010 (0.534)	0.003 (0.805)
<i>ARINV</i>	-0.034 (0.695)	-0.037 (0.727)	-0.061 (0.563)
<i>LEV</i>	0.160 ^{***} (0.000)	0.161 ^{***} (0.004)	0.166 ^{***} (0.000)
<i>ROA</i>	-0.018 (0.885)	0.036 (0.846)	-0.064 (0.669)
<i>Loss</i>	0.019 (0.474)	0.021 (0.587)	0.022 (0.526)
<i>Sale</i>	0.194 ^{***} (0.000)	0.197 ^{***} (0.000)	0.188 ^{***} (0.000)
<i>RET</i>	-0.024 ^{**} (0.042)	-0.060 (0.211)	-0.022 [*] (0.086)
<i>STDRET</i>	0.882 (0.135)	-0.239 (0.815)	1.394 ^{**} (0.034)

续表

	全样本	2001-2004 年 (低诉讼风险阶段)	2006-2009 年 (高诉讼风险阶段)
<i>Export</i>	0.002 (0.941)	-0.003 (0.919)	0.008 (0.790)
<i>Big4</i>	0.530 ^{***} (0.000)	0.219 ^{***} (0.008)	0.805 ^{***} (0.000)
<i>SqrtSegment</i>	0.112 ^{***} (0.000)	0.062 ^{**} (0.032)	0.146 ^{***} (0.000)
<i>Initial</i>	-0.018 (0.428)	-0.001 (0.984)	-0.034 (0.283)
Intercept	8.527 ^{***} (0.000)	8.575 ^{***} (0.000)	9.004 ^{***} (0.000)
Year dummies	控制	控制	控制
Industry dummies	控制	控制	控制
N	3,600	1,715	1,885
Adj. R ²	0.405	0.294	0.467

注: (1) *** 表示在 1% 的水平下显著, ** 表示在 5% 的水平下显著, * 表示在 10% 的水平下显著; (2) 括号内为 *p* 值; (3) 本表按照公司代码进行了 Cluster 处理。

(二) 进一步分析

1. 媒体负面报道的内容、诉讼风险与审计收费

根据媒体负面报道的内容,本文将其划分为会计方面的负面报道和其他方面的负面报道。会计方面的负面报道 (*NegPRS_Acct*) 指与财务报表及报表附注相关的媒体负面报道,包括公司亏损、舞弊、会计政策变更、资产减值等方面的报道。其他方面的负面报道 (*NegPRS_Oth*) 指与公司经营管理及其他方面相关的媒体负面报道,包括公司治理、大股东变更或股份减持等方面的报道。如表 7 所示,当媒体负面报道涉及会计方面的问题时,在全样本情况下, *NegPRS_Acct* 的系数是 0.042, *P* 值为 0.020,而 *NegPRS_Oth* 的系数为 -0.003, *P* 值为 0.897。这表明会计方面的媒体负面报道对审计收费产生了显著的影响,而其他方面的媒体负面报道则未对审计收费产生显著影响。这可能是因为,审计师承担民事责任的范围是虚假陈述,作为专业技术人员,对于会计方面的负面报道可能带来的审计风险,他们会通过扩大审计范围和增加实质性测试程序来加以控制,如此则不可避免地增加了审计师的审计成本,审计收费亦将因此提高,同时也可能预估计了一些未来诉讼风险的损失。而对于非会计方面的负面报道,审计师控制能力较弱,能够采取的控制风险的措施有限,不会大量增加审计成本,同时,审计师承担民事责任的范围也主要是与会计相关的虚假陈述,因此,审计师可能对此也不会过分关注,因而对审计收费无明显影响。

在低诉讼风险阶段,无论媒体负面报道的内容是会计

方面或者其他方面,相关变量的系数均不显著,因此两类媒体负面报道对审计费用均无明显影响。在高诉讼风险阶段, *NegPRS_Acct* 的系数为 0.052, P 值为 0.025。 *NegPRS_Oth* 的系数为 -0.015, P 值 0.622。这些结果告诉我们,会计方面的媒体负面报道对审计费用的影响只有在法律环境得到改善,即只在高诉讼风险环境下才能显著地存在。

表7 媒体负面报道内容、诉讼风险与审计收费

	全样本	2001-2004 年 (低诉讼风险阶段)	2006-2009 年 (高诉讼风险阶段)
<i>NegPRS_Acct</i>	0.042** (0.020)	0.025 (0.357)	0.052** (0.025)
<i>NegPRS_Oth</i>	-0.003 (0.897)	0.006 (0.858)	-0.015 (0.622)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Intercept	控制	控制	控制
Year dummies	控制	控制	控制
Industry dummies	控制	控制	控制
N	3,600	1,715	1,885
Adj. R ²	0.406	0.296	0.467

注: (1) *** 表示在 1% 的水平下显著, ** 表示在 5% 的水平下显著, * 表示在 10% 的水平下显著; (2) 括号内为 p 值; (3) 本表按照公司代码进行了 Cluster 处理; (4) 为节约篇幅, 该表对控制变量进行了简单报告处理。

2. 媒体负面报道的重复度、诉讼风险与审计收费

我国纸质媒体可以划分为报刊和杂志, 其中报刊和杂志又有很多分类。关于上市公司的负面新闻由一家媒体首次报道之后, 会有更多的媒体进行重复报道。尽管重复报道表明了舆论的关注程度, 但由于其没有信息增量, 审计师作为专业人士可能不会过多地关注。我们进一步分析了媒体重复报道是否会对审计收费产生影响。根据媒体报道的重复度我们将媒体负面报道划分为媒体首次报道 (*NegPRS_First*) 和媒体重复报道 (*NegPRS_Repeat*)。如表 8 所示, 以全样本为研究对象时, *NegPRS_First* 系数为 0.031, P 值为 0.072; *NegPRS_Repeat* 的系数为 -0.011, P 值为 0.742。这说明审计师会对首次媒体负面报道带来的潜在诉讼风险会予以重视, 增加审计收费, 而对媒体重复报道则并未予以重视。这可能是因为媒体重复报道并没有产生增量信息, 作为专业人士的审计师能够予以识别, 因此对审计费用没有产生明显影响。

同样, 在低诉讼风险阶段, 关于媒体负面报道重复度的相关变量系数均不显著, 因此其对审计费用均无明显影

响; 在高诉讼风险阶段, *NegPRS_First* 的系数为 0.039, P 值为 0.086。 *NegPRS_Repeat* 的系数为 -0.061, P 值 0.144。这些结果告诉我们, 首次媒体负面报道对审计费用的影响也只有在法律环境得到改善, 即在高诉讼风险环境下才能显著地存在。

表8 媒体负面报道重复度、诉讼风险与审计收费

	全样本	2001-2004 年 (低诉讼风险阶段)	2006-2009 年 (高诉讼风险阶段)
<i>NegPRS_First</i>	0.031* (0.072)	0.012 (0.664)	0.039* (0.086)
<i>NegPRS_Repeat</i>	-0.011 (0.742)	0.070 (0.157)	-0.061 (0.144)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Intercept	控制	控制	控制
Year dummies	控制	控制	控制
Industry dummies	控制	控制	控制
N	3,600	1,715	1,885
Adj. R ²	0.405	0.294	0.467

注: (1) *** 表示在 1% 的水平下显著, ** 表示在 5% 的水平下显著, * 表示在 10% 的水平下显著; (2) 括号内为 p 值; (3) 本表的回归按照公司代码进行了 Cluster 处理; (4) 为节约篇幅, 该表对控制变量进行了简单报告处理。

五、额外测试与稳健性检验

(一) 额外测试: 媒体负面报道与行政处罚

根据我国的司法解释规定, 投资者起诉上市公司必须以中国证监会等监管部门的生效处罚决定为依据方可起诉公司和审计师等。这样, 事务所面临诉讼风险的前提是公司必须受到监管部门的行政处罚。如果在低诉讼或高诉讼风险阶段, 媒体负面报道没有引起监管部门的介入调查和处罚, 就可能是监管环境阻断了投资者的上诉路, 从而使审计师面临的民事诉讼风险为零。那么, 本文的核心观点——诉讼风险之说就不成立。借鉴 Chen et al. (2010) 和刘启亮等 (2013) 的做法, 我们分析了媒体负面报道与行政处罚的关系, 如果公司在本年度审计报告日之后至下一年审计报告日之前因会计信息质量问题受到了监管部门的行政处罚, 取值为 1, 否则为 0。控制变量的定义与 Chen et al. (2010) 和刘启亮等 (2013) 相同。样本选择方法与表 2 自比样本的选择方法一致, 共得到 5404 个观察值。媒体负面报道变量 (*NegPRSnumb*) 采用媒体负面报道的次数来衡量。

如表 9 所示, 无论是全样本, 还是低诉讼风险阶段或高诉讼风险阶段, *NegPRSnumb*^③ 的系数均显著为正。这

③ 这里, 如果媒体负面报道变量使用哑变量 (*NegPRS*) 来衡量, 得到的结果也与表 9 一致。

表明在 2001 - 2009 年的整个样本期间 (不含 2005 年), 媒体负面报道都容易引起监管部门的介入调查并给予相应的行政处罚, 从而给投资者提供了相同的起诉审计师的机会, 审计师面临相同的被投资者起诉的潜在风险。结合表 1 的统计数据来看, 可能是由于在 2006 年之前我国的法律执行较差, 尽管投资者有起诉公司和审计师的机会, 但由于法院的不积极作为, 使他们上诉无门, 从而也没有给公司和审计师产生应有的威慑作用, 在 2006 年之后, 这种状况有了明显的改变, 法律执行明显得到改善, 也对审计师等产生了相应的威慑作用, 从而迫使审计师通过提高审计收费来控制预期的诉讼风险。

表 9 媒体负面报道与行政处罚

Variable	全样本	2001 - 2004 年 (低诉讼风险阶段)	2006 - 2009 年 (高诉讼风险阶段)
<i>NegPRNumb</i>	0.201 *** (0.000)	0.225 *** (0.000)	0.186 *** (0.004)
<i>AR</i>	3.005 *** (0.000)	3.153 *** (0.000)	2.698 ** (0.020)
<i>INV</i>	-1.106 (0.150)	-2.562 ** (0.023)	0.053 (0.952)
<i>Turnover</i>	-0.678 *** (0.004)	-1.099 *** (0.004)	-0.414 (0.154)
<i>LEV</i>	0.441 ** (0.048)	0.213 (0.586)	0.593 ** (0.036)
<i>Capital</i>	-0.466 * (0.067)	-0.360 (0.297)	-0.625 (0.102)
<i>STDRET</i>	12.480 ** (0.020)	9.751 (0.300)	12.920 * (0.055)
<i>EM</i>	0.084 (0.671)	0.303 (0.266)	-0.126 (0.673)
<i>Local</i>	-0.197 (0.217)	-0.304 (0.194)	-0.139 (0.542)
<i>Size</i>	-0.292 *** (0.002)	-0.008 (0.951)	-0.504 *** (0.000)
<i>IndBoard</i>	-1.608 (0.238)	-1.095 (0.506)	-3.290 (0.100)
Intercept	2.089 (0.322)	-3.787 (0.226)	7.312 ** (0.032)
Year dummies	控制	控制	控制
Industry dummies	控制	控制	控制

续表

Variable	全样本	2001 - 2004 年 (低诉讼风险阶段)	2006 - 2009 年 (高诉讼风险阶段)
<i>N</i>	5,404	2,719	2,659
Pseudo <i>R</i> ²	0.104	0.116	0.127

(二) 稳健性检验

我们实施了如下稳健性测试:

1. 按照 Dao et al. (2012) 的做法, 我们控制了审计师选择内生性问题以后, 按文中表 6、表 7 和表 8 的模型进行了回归, 发现结果基本一致, 表明本文结果基本不受审计师选择内生性问题的影响。

2. 如表 2 所示, 我们使用横比样本 (观察值为 4186 个), 按照文中表 6、表 7 和表 8 的模型进行了回归, 发现结果一致并有所改善。

3. 如表 2 所示, 我们使用全部样本观察值 (样本观察值为 6691 个) 按文中表 6、表 7 和表 8 的模型进行了回归, 发现结果一致。

4. 我们查看了所有回归结果的 VIF 值和 DW 值, 发现 VIF 值均在 2.5 以内, DW 值在 2 左右, 表明模型不存在明显的共线性问题与序列自相关问题。

5. 按照 Chen et al. (2010) 的方法, 我们对文中表 6 的变量 *NegPRS*、表 7 的变量 *NegPRS_Acct* 和 *NegPRS_Oth*、表 8 的变量 *NegPRS_First* 和 *NegPRS_Repeat*, 按低诉讼风险阶段 (2001 - 2004) 和高诉讼风险阶段 (2006 - 2009) 两个阶段进行了系数差异检验, 发现表 6 中的变量 *NegPRS* 的系数差异并不显著, 表 7 的变量 *NegPRS_Acct* 和表 8 的变量 *NegPRS_First* 的系数在两个阶段存在显著差异, 而表 7 的变量 *NegPRS_Oth* 和表 8 的变量 *NegPRS_Repeat* 的系数在两个阶段都不存在显著差异。这进一步增强了文中结果的可靠性。

六、结论与总结

本文主要研究媒体负面报道对审计收费的影响, 并进一步探讨了这种影响的实现路径。利用我国独有的 2006 年法律环境的变化, 本文发现: 公司面临的媒体负面报道越多, 审计收费越高。进一步分析发现, 会计方面的媒体负面报道和首次媒体负面报道会引起审计师提高审计收费, 并且, 这些影响均只存在于高诉讼风险的环境下。此外, 本文还发现, 无论是高风险阶段还是低风险阶段, 媒体负面报道都会使公司容易受到监管部门的行政处罚, 从而给投资者提供了相同的起诉机会, 这增强了本文的理论基础——诉讼风险之说。

简言之, 本文表明, 由于 2006 年及之后法律环境的改善, 媒体负面报道对审计师的审计收费行为产生了较为明显的治理作用, 而在这之前, 则没有这种效果。因而, 本文的最大政策启示意义在于: 与法律较为完善的成熟市场经济相比, 在转型经济中, 媒体的治理作用可能主要还需通过法律环境的改善来实现, 而不是通过声誉机制来达到目的。

主要参考文献

- 蔡吉甫. 2007. 公司治理、审计风险与审计费用关系研究. 审计研究, 3: 65~71
- 冯延超, 梁莱歆. 2010. 上市公司法律风险、审计收费及非标准审计意见. 审计研究, 3: 75~81
- 韩厚军, 周生春. 2003. 中国证券市场会计师报酬研究——上市公司实证数据分析. 管理世界, 2: 15~22
- 孔东民, 刘莎莎, 应千伟. 2013. 公司行为中的媒体角色: 激浊扬清还是推波助澜? 管理世界, 7: 145~162
- 李明辉, 张娟, 刘笑霞. 2012. 会计师事务所合并与审计定价——基于2003—2009年十起合并案面板数据的研究. 会计研究, 5: 86~94
- 刘斌, 叶建中, 廖莹毅. 2003. 我国上市公司审计收费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深沪市2001年报的经验证据. 审计研究, 1: 44~47
- 刘启亮, 李伟, 张建平. 2013. 媒体负面报道、诉讼风险与审计契约稳定性——基于外部治理视角的研究. 管理世界, 11: 69~80
- 刘笑霞. 2013. 审计师惩戒与审计定价——基于中国证监会2008—2010年行政处罚案的研究. 审计研究, 2: 90~98
- 吕敏康, 冉明东. 2012. 媒体报道影响审计师专业判断吗? ——基于盈余管理风险判断视角的实证分析. 审计研究, 6: 82~89
- 宋衍衡. 2011. 审计风险、审计定价与相对谈判能力——以受监管部门处罚或调查的公司为例. 会计研究, 2: 79~84
- 伍利娜, 王春飞, 陆正飞. 2012. 企业集团统一审计能降低审计收费吗? 审计研究, 1: 69~77
- 邢立全, 陈汉文. 2013. 产品市场竞争、竞争地位与审计收费——基于代理成本与经营风险的双重考量. 审计研究, 3: 50~58
- 杨德明, 刘敏. 2013. 媒体监督影响了审计师决策么. 中国会计与财务研究, 1: 1~41
- 杨德明, 赵璨. 2012. 媒体监督、媒体治理与高管薪酬. 经济研究, 6: 116~126
- 朱春艳, 伍利娜. 2009. 上市公司违规问题的审计后果研究——基于证券监管部门处罚公告的分析. 审计研究, 4: 42~51
- 张天舒, 黄俊. 2013. 金融危机下审计收费风险溢价的研究. 会计研究, 5: 81~96
- 张宜霞. 2011. 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审计收费的影响因素——基于中国内地在美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会计研究, 12: 70~77
- Abbott, L., S. Parker, G. Paters, and K. Raghunandan. 2003.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Audit Committee Characteristics and Audit Fees. Auditing: A Journal of Practice and Theory, 22 (2): 17~32
- Chen, S., S. Y. J. Sun, and D. Wu. 2010. Client Importance, Institutional Improvements and Audit Quality In China: An Office and Individual Auditor Level Analysis. The Accounting Review, 85 (1): 127~158
- Dao, M., K. Raghunandan, and D. V. Rama. 2012. Shareholder Voting on Auditor Selection, Audit Fees, and Audit Quality. The Accounting Review, 87 (1): 149~171
- DeFond, M., F. Francis, and T. Wong. 2000. Auditor Industry Specialization and Market Segmentation: Evidence from Hong Kong. Auditing: A Journal of Practice and Theory, 19 (1): 49~66
- Fan, J. P. H., and T. J. Wong. 2005. Do External Auditors Perform a Corporate Governance Role in Emerging Markets? Evidence from East Asia. 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 43 (1): 35~72
- Fang, L., and J. Peress. 2009. Media Coverage and the Cross-section of Stock Returns. The Journal of Finance, 64 (5): 2023~2052
- Firth, M. 1985. An Analysis of Audit Fees and their Determinants in New Zealand. Auditing: A Journal of Practice and Theory, 4 (2): 23~37
- Firth, M., and T. Lau. 2004. Audit Pricing Following Mergers of Accounting Practices: Evidence from Hong Kong. Accounting and Business Research, 34 (3): 201~213
- Francis, J. 1984. The Effect of Audit Firm Size on Audit Prices.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6 (2): 133~151
- Hogan, C., and M. Wilkins. 2008. Do Internal Control Weaknesses Result in Lower Earnings Quality? Implications and Evidence from the Audit Risk Model. Working Paper, Southern Methodist University
- Iyer, V. M., and G. S. Iyer. 1996. Effect of Big 8 Mergers on Audit Fees: Evidence from the United Kingdom. Auditing: A Journal of Practice & Theory, 15 (2): 123~132
- Krishnan, J., D. Rama, and Y. Zhang. 2008. Costs to Comply with SOX Section 404. Auditing: A Journal of Practice & Theory, 27 (1): 169~186
- Newton, J. D., and R. H. Ashton. 1989.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Audit Technology and Audit Delay. Auditing: A Journal of Practice & Theory, 8 (Supplement): 22~49
- Pong, C. K. M., and S. Burnett. 2006. The Implications of Merger for Market Share, Audit Pricing and Non-Audit Fee Income: The Case of PricewaterhouseCoopers. Managerial Auditing Journal, 21 (1): 7~22
- Raghunandan, K., and D. Rama. 2006. SOX Section 404 Material Weakness Disclosures and Audit Fees. Auditing: A Journal of Practice & Theory, 25 (1): 99~114
- Simunic, D. A. 1980. The Pricing of Audit Services: Theory and Evidence. 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 18 (1): 161~190
- Stice, J. D. 1991. Using Financial and Market Information to Identify Pre-engagement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Lawsuits Against Auditors. The Accounting Review, 66 (3): 516~533
- Wang, Q., T. J. Wong, and L. Xia. 2008. State Ownership, the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and Auditor Choice: Evidence from China.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46 (1): 112~134

Why Business Process Management Always Loses More and Wins Less?

——A Managerial Accounting Perspective

Yu Zengbiao & Sang Xiangyang

Based on questionnaire survey,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business process management and managerial accounting system in Chinese firms. The study constructs business process management system which contains strategy,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implementation; and managerial accounting system which contains goal-setting, monitoring, and incentive schemes. The study finds that the lack of managerial accounting system leads to the failure of business process management. Statistical data show that activity/supply chain management and use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organization performance only through the managerial accounting system. Statistical data also show that the combinations of goal-setting with organization strategy, monitoring with the three elements of process management system have significant positive influences on the organization achievements. Obviously managerial accounting system can improve information efficiency in business process management practice.

Internal Pay Dispersion, Ownership Concentration and Earnings Management

——Basing on the Salaries Comparative Analysis

Yang Zhiqiang & Wang Hua

Basing on the data of Chinese A-share listed companies from 2002 to 2011,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enterprises' internal pay dispersion's impact on earnings management. Empirical evidence suggests that, the greater the internal pay dispersion, the higher degree of executive's earnings management have, and compared to the decentralized or check-and-balance ownership structure companies, this effect is more significant in concentration ownership structure companies. Further studies show that, the above relationship is the joint effect of the shareholders' and executives' motivation, and the existing of management authority intensify it. Even in the situation that executives gains more when comparing with other companies' executives in the same industry, it doesn't alter the internal pay dispersion inducing more earnings management behavior.

Do CEO Incentives Improve the Effectiveness of Internal Control?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Listed State-Owned Enterprises

Lu Dong et al.

Using the data of Chinese listed state-owned enterprises (SOE), the paper examines the impact of CEO incentives on the effectiveness of internal control. We find that, granting moderately excessive monetary payment and equity ownership to CEOs can enhance the effectiveness of internal control; compared to those counterparts without administrative experience, CEOs with administrative experience weaken the role of incentives in implementing effective internal control. The empirical evidence suggests that CEO incentives are critical to implement effective internal control. The existing practice of politically appointed CEOs in listed state-owned enterprises twists market-oriented incentive mechanism, which jeopardizes the effectiveness of internal control.

Environmental Motivation, Conflict Coordination and Governmental Financial Information Disclosure

Pan Jun et al.

Motivated by institutional evolution and public accountability, the governmental financial information disclosure requires coordination of multi-level conflictions among interest parties, between rules and methodologies, and in different organizations. Based on the theory of institutional evolution and of confliction, this paper discusses how environmental factors have motivated the disclosure of governmental financial information, and how game playing behaviors of stakeholders and balancing of powers have played essential roles in fueling that continued disclosure. A conceptual framework in the perspective of environmental motivation and conflict coordination is proposed in this paper, and suggestions are made on how to improve related disclosure system by developing progressive disclosure model and implementing more governance and supervision.

Negative Press Coverage, Litigation Risk and Audit Fees

Liu Qiliang et al.

The paper studies the effect of negative press coverage on audit fee, and further explores the path to achieve this effect. Employing China's A shares mainboard data from 2001 to 2009, we find that the more negative press coverage companies encounter, the higher audit fee auditors charge. Further analyses express that negative press coverage in accounting and first-reported negative press coverage brings about higher audit fees charged by auditors while that only occurs in the high litigation risk period. In addition, whether during the low or high litigation risk period, negative press coverage will bring companies regulatory sanctions more likely. The paper suggests that governance role of the media in audit may be achieved by improving legal environment in transition economy.

State Ownership and Auditor Choice in IPO Market

Wang Chengfang & Liu Huilong

Auditor choice is the core issue of auditing research. This paper first studies how state ownership impacts on auditor choice and its specific mechanism in Chinese A-share IPO market. We find that probability of choosing high quality auditors decreased with state ownership ratio. The high quality auditors can reduce IPO underpricing when state ownership ratio is low. However, increasing the proportion of state-owned shares will damage the function of high quality auditors reduce IPO underpricing. It suggests that state ownership impacts on auditor choice of IPOs is because of state ownership damages high quality auditor's role in reducing IPO financing cost, which decrease the demand of high quality auditor.